

長安史蹟叢刊

◎ 主編 魏全瑞

西京雜記

〔晉〕葛洪撰

周天游校注

三秦出版社

長安史蹟叢刊

主編 魏全瑞

西京雜記

〔晉〕葛洪 撰

周天游 校注



三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西京雜記/(晉)葛洪撰;周天游校注.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6.1

(長安史蹟叢刊/魏全瑞主編)
ISBN 7-80628-992-5

I. 西... II. ①葛... ②周... III. 筆記小說—作品集
—中國—東晉時代 IV. I24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16324 號

長安史蹟叢刊
西京雜記

(晉)葛洪撰

周天游校注

出版發行 三秦出版社

新華書店經銷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131號

電話 (029)87205106

郵政編碼 710003

印刷 西安永惠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10.5

字數 190千字

版次 二〇〇六年一月第一版

二〇〇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5000

標準書號 ISBN 7-80628-992-5/K·444

定價 壹拾捌圓整

出版說明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爲了全面整理有關古長安的史地文化典籍，著名史學家史念海教授和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提出了編纂古長安叢書的設想，史先生任主編，出版事宜則全部交給三秦出版社。經過各方努力，先後推出了隋唐兩京叢考和三輔黃圖校注，受到學界好評。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叢書的出版遇到了諸多困難。近來，隨着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加之我社綜合實力漸強，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要把前輩學者開創的這項整理古長安歷史文獻的事業繼續做好。鑒於各方面情況變化較大，我們對原先的計劃作了調整，決定編輯出版一套全新的長安史蹟叢刊，收入類編長安志、西京雜記、兩京新記等十數種歷代撰述，先前已出和將出的三部書也納入叢刊，按照新的要求重新出版。可以說叢書基本包括了有關古代陝西尤其是古長安地域文化的經典作品。叢刊的總序仍然採用史先生原撰總序，一來表示不忘先生開創之功，二來是由於先生的序文高屋建瓴，縱論古今，其中關於古長安史地撰述整理與研究的精辟論述，完全適合長安史蹟叢刊。

總序

史念海

長安作爲古都，歷史最爲悠久。長安之名，始於秦時。周的豐鎬即在其西南，秦的咸陽亦位於渭河北岸，雖少有間隔，地理因素大致相若，故言上古的史事，率應視作一體；論都城的建置，亦上溯至於周初。由西周肇始，在這裏建都的有秦、西漢、新、隋、唐等統一的王朝，而東漢的獻帝及西晉的愍帝，也曾在這裏作過較爲短暫的稽留。分裂時期在這裏建都的政權，則有十六國時期的前趙、前秦、後秦和南北朝的西魏、北周。東漢初年，劉玄和赤眉，唐末的黃巢和明末的李自成也均在這裏建立過都城。總起來說，在這裏建都的，先後有六個統一的王朝和十一個政權，共計一千九百九十一年。

都城爲一代人文薈萃之地，有關都城的撰述亦較他處爲豐碩。長安作爲都城，不僅歷年最久，且山川秀麗，物產富饒，處於四塞之內，儼然天府之國，尤爲當時後世所稱道。故有關撰述亦最多。今所知者，殆以辛氏三秦記爲最早。辛氏此書不見於隋書經籍志及兩唐書經籍藝文諸志的著錄，然三輔黃圖及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皆有所徵引，而所記又皆秦漢都邑、宮室、苑囿地理，當出於漢時人

士手筆。此後諸家撰述，接踵而起，三輔黃圖兩京新記長安志雍錄皆其著者。

辛氏三秦記綜述都邑宮室，故能巨細兼載，自成一書。而專論一方面的，也早有名家。司馬相如上林賦，揚子雲甘泉賦先後輝映。梁蕭統撰集文選，以上林賦列於畋獵類中，以甘泉賦置於郊祀類內。上林爲規模巨大的苑囿，甘泉於離宮中最負盛名。兩賦對於這樣的苑囿和離宮都作細膩的描述，雖所言不免有誇大不實之處，當時長安附近建築設施的雄偉壯麗，藉此亦略可見其一斑。及班孟堅兩都賦和張平子兩京賦出，更能顯示全豹。所謂兩都兩京，皆係以洛陽與長安相提並論。東漢都洛陽，故賦京都者，不能不有所涉及。其時長安已廢不爲都，而瑰麗却仍不減當年，甚至猶能和洛陽比肩齊聲。

由於長安的山川秀麗，人物薈萃，故四方景慕，咸思瞻仰，是以遠道蒞臨，觀風俗者，時有所聞。甚至王朝更易，都城他移，仍未稍替。其履履所及，耳聞目濡，往往撰有記述，舊典新章，多能引人入勝。潘岳西征賦殆其著者。安仁爲長安令，由洛陽西行。所記雖多途中聞見，而於長安城中景物，更能不惜筆墨。當其初抵秦郊，觸目所見，「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當時長安已淪爲常邑，猶能如此富庶，當年都城的景物，略可想見。

歷來詩人對於都城長安的歌誦，尤多佳句名章。詩三百篇於國風中，列有豳風、秦風和周召二南，然於豐鎬兩京却未多所涉及。不過雅頌諸篇中，有關的吟詠，並非少見。小雅白華：「灑池北流，浸彼稻田」；大雅靈臺：「麇鹿濯濯，白鳥膏膏」，豐鎬城郊的風物歷歷如在目前。唐代詩家歌誦長安，其詩篇的數量和內容，皆能超越前代。後世對於唐長安較之漢長安更爲清晰明瞭，這應是其中的一個重要

原因。

就在長安廢不爲都時，有關的撰述仍陸續見於著錄，可見長安爲世人重視的程度。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錄皆撰述於宋代。宋敏求時，長安猶隸於宋朝版圖，而當代建設亦有新績；程大昌時，長安已爲金人所據有，不過前代流風餘韻，並未因之或泯，故此數家著述，得爲當時後世所稱道。

這樣豐碩而又復絢麗的撰述，古長安的往事遺蹟賴以流傳和保存，值得珍視；只是由於傳世已久，間有殘缺散佚，難得全帙；即今幸存於今，由於輾轉鈔錄，魯魚亥豕的訛誤又在所難免。而古今地名復累經改易，舊蹟往往未能確指，致使前賢功績，仿佛輕擲虛牝。如何使之發揮更多更大的作用，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當前黨和政府組織各方力量整理古籍，允爲一代勝事。古長安叢書也得在這盛世開始編纂，早日克奏膚功，是各方共同的期望。

由於前賢有關著述相當繁多，古長安叢書擬分集編纂，近人撰述亦往往有涉及古長安的，自應一併收錄，俾究心往事者，不必多所問津。初步斟酌，分成五集：

甲集、 全部撰述，或後世的輯本；

乙集、 專篇撰述，或由其他著作中節錄的有關篇章；

丙集、 記遊撰述而未集成專著者；

丁集、 詩詞歌曲；

戊集、 近人專著。

如前所說，有關古長安的撰述，由於傳世已久，難免多所訛誤，且刊本較多，間有相互參差之處。故整理時，務須詳加校勘注解，俾使章節句讀的斟酌，字詞義例的闡釋，篇章段落的分析，情緒思想的反映，皆能有所顯現。這都是整理古籍的基本功夫，無容多事贅陳。古長安的有關撰述率多與地理有關。地理時有變遷，古今頗難一致。政區的增損，城池的興廢，鄉聚的分佈，關隘的建置，道路的通塞，疆場的改易，以及河流的移徙，湖泊的湮涸，植被的變化，動物的存沒，有關撰述中是不乏記載的。由於歷年較久，與現今多有違異。雖間有舊說詮釋，却難免舛訛，而輾轉相傳，治絲愈紊，更不易得其真象，前代學人於此，多力於考證，成就斐然可觀，自宜繼踵舊規，期臻完密。而長安古事，有待斟酌者尚復不少，唐代長安城內有都亭驛，長安志謂在敦化坊，徐松、董祐誠皆承其說，而未有是正，然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謂在朱雀街。證以太平御覽所引兩京新記，駱天驤類編長安志及續高僧傳等書，則都亭驛實在朱雀街西通化坊，與敦化坊無關。霸上為長安城東衝要之地，酈道元水經注既謂其地在白鹿原上，又謂在霸橋東端。後之論者多取前說，間有兼取後說，而未細究其間曲折。然證以晉書，桓溫北伐至霸上時，王猛問他為什麼長安近在咫尺，而不渡霸水？可證霸上實在霸水之東，並非在白鹿原上。這樣的考證對於解釋古長安的史事是有裨益的。古長安叢書的纂集應該在這方面多所致力。

可是所有考證並非都能了無訛誤。就以霸上而論，其所在雖有兩說，却迥然各異。白鹿原東倚霸水，地勢陡絕，高低相差，頗為懸殊。桓溫抵達關中時，秦軍已在白鹿原上，循霸佈防，桓溫何能越水而登上原頭？其間道理，至為明顯，稍一涉足其地，便可豁然洞曉，而一些所謂考證，尚瑣瑣喋喋，徒費筆墨，

令人齒冷。其他事例亦復不少，無煩備舉。以此而論古長安史事，殆難悉其究竟。補苴不足，就必須對地理從事實地考察。以實地考察與文獻考證相對覈，才能確實無誤，而且還應進一步分析說明其變化的前因後果，反映其間的一定規律。

終南山側，峪口連綿不絕。峪中率多皆有溪澗流下，匯而成川，故長安城南多水。居人引水成渠，徧於田塍，水色澄清，倒影如畫，稍加興建，便能引人人勝。唐代永安渠導澗，交之水入城，城南渠上築橋不少。石梁橫懸，即成遊覽勝地。杜甫詩中就曾一再吟詠：「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皇陂即皇子陂。皇子陂中菡萏香溢，亭亭覆蓋。以第五橋和皇子陂媲美，則其地的幽雅可以略見一斑。第五橋何在？張禮在遊城南記中提到：「今第五橋在韋曲西，與沈家橋相近。」說得相當概括，具體所在還得考覈。今西萬公路旁有東西兩第五橋村，第五為唐代關中大姓，今村中却無姓第五者，是村名當與橋名有關。村之四周不見有橋。原來四十年前這裏僅有一村，並無公路。村之東南積水長存，不能種田。後來，填水修路，又填水建村。今日站在公路上，四面遠眺：公路高於兩側田地，路西兩村略低，路東低窪更甚。到低窪而無積水處掘起一抔土，竟有大半沙粒。顯係渠水流經的地方。第五橋當在此處。更北有沈家橋村，村名亦以橋名。橋在何處？今公路之東約一華里處，一片柳蔭。濃密樹叢之下掩映一段水溝。溝內有水，水為地面流淌的積水，惟淤泥甚厚。溝岸上有石橋舊址。大石早已移作他用，小石累累，排列平整，向遠延伸，岸形明顯。測量得知，原橋長約五米，寬可過一馬車。橋址在大田之中，與村無路相連。橋旁故老，娓娓敘述，唐時舊蹟，了無疑意。

遊城南記提到兩唐書記載：杜正倫「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當時，瀾河由少陵原朱坡之側，迤邐流向西北至於神禾原畔。如能改變原側高地，當可灌溉更多農田。杜正倫當係因此而建言鑿河引水的。不料施工開鑿，却是川流如血。這自然是雜糅有迷信色彩。究竟如何？自須再作考察。這就要探索唐代瀾水的流逕，還須考察杜固的所在。杜固位置，一說在馬崩崖，一說在鳳凰嘴。前者又有二處，一在王莽村近處的原畔、瀾河邊，一在瀾河源頭南山之下。揆諸地勢和川原形狀，這兩者均不可能。也許鳳凰嘴就是杜固？鳳凰嘴在彰儀村東北，神禾原上。站在少陵原向西遠望，此處正是瀾河沿神禾原折西北流的地方。走下少陵原來到樊川，再近到瀾河邊仰望，其東、南、北三面突出，超越原外，如同半島。以鳳凰嘴命名，十分形象。從相鄰的北新街村直北的小路可以捷便前往。這條牧羊人日久天長踩踏成的小路，蜿蜒崖畔，再前則無路可行。攀緣崖上高低雜樹，穿林而上，始達其地。這是神禾原邊獨特的地形，絳紅色的土質，雜有紅色更重的小砂，更顯得獨特。所謂川流如血者，殆為紅土紅砂隨水逐流而下，使水流成爲血色。

詩大雅文王有聲篇曾經說過：「豐水東注，維禹之蹟」。可是現在豐水北流入渭，與周時竟不相同。這應不是詩人的誤筆，而是古今有所變化。輞川爲唐時王維別業所在，其集中有題詠二十首，久已膾炙人口，而輞川因之亦有名當世。輞川有南坨北坨，王右丞集中南坨絕句：「輕舟南坨去，北坨森難即。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現在輞川溪水已相當細小，甚至可以徒跣涉越，溪中山石破礮，大者如桌，小者如几，如何還能行船？實地考察並非一望了事，探索其間變化的原因和過程，顯然是不可稍事疏忽

的。這樣一些變化，有人爲的作用，也有自然的因素。涉及自然的因素，就不能不和自然科學有關。這就不是文字考證所可以解決的。

實地考察是應該和文獻記載相結合的。實地考察離開文獻記載，就難得切合實際。文獻記載是有其不足之處的。若非出於第一手史料，就不能說沒有差錯。就是出於第一手史料，也不能說就一定確實。如果不能指出其錯誤的所在，還是不應輕易捨棄的。整理有關長安的古籍，對此是不宜稍事忽略的。長安多古蹟，秦漢時離宮別苑相當繁多，有關載籍也多所記述。甘泉宮和池陽宮都是相當有名的宮殿。秦漢帝王多在甘泉宮決定朝政大計，而且爲直道發軔之所。漢宣帝接見匈奴呼韓邪單于，即由甘泉歸來，宿於池陽宮，以便在長平阪上舉行接見大禮，然後回到長安，再賜盛宴。這是匈奴降附之後，單于的初次入覲，爲少有的盛典。近來有人說於乾縣泔水旁發現甘泉宮遺址，又有人說於三原縣嵯峨山下發現池陽宮遺址。甘泉宮如果在乾縣泔水旁，直道如何能在其地發軔？又如何解釋應劭所說的甘泉宮在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嵯峨山下所謂池陽宮，據說距漢長安城七十公里，也就是一百四十華里，則距長平阪亦當有九十里。漢宣帝怎能當天走完這麼遠的路程，並舉行有數萬人參加的接見大典？又如何解釋三輔黃圖所說的池陽宮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阪，去長安五十里？據說所謂甘泉宮和池陽宮都有瓦當等遺物的發現，這些遺物上雖無文字，却和秦咸陽和漢長安城內的宮殿遺址的瓦當等遺物相同。這些遺物誠然可貴，然未能與文獻記載相互覈實，還是不足取的。長安附近離宮別苑既然很多，瓦當等遺物都應該有所發現，怎能不結合文獻記載，而冒然去確定宮殿？

整理有關長安古籍，可資借鑑和斟酌的，當非少數。前哲舊軌自宜多所遵循，然亦不能墨守成規，先後如出一轍。其間難免有所損益。這裏所不能已於言者，則爲整理之時，如前所云，應作實地考察，山僻水涯，通塗絕徑，舊址遺蹟，斷碣殘碑，皆須親臨究問，得自目驗，再以之與文獻記載相勘證，而後作出相應的論斷。若坐擁書城，不出戶庭，僅以翻檢舊典爲能事，殆不足以言整理有關長安的古籍。當世方家或不至河漢斯言也。

前 言

西京雜記是一部充滿神秘和疑點而又極具誘惑力的古代著作，是一部雜抄西漢故實和軼聞逸事的薈輯之書。其所述雖稱不上大貴大雅，但是上及帝王將相，下及士農工商，乃至宮女僮隸，事涉典制禮儀，天文地理，官室苑囿，草木蟲魚，奇珍異寶，風俗民情，還包括詩賦辭曲，文論書函和秘聞趣事，採摭之宏富，令人嘆為觀止。該書既具有不可輕視的文學價值，同時也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自南北朝以來，它一直處於學者的諷誦借鑒和抨擊蔑視的矛盾旋流中，頑強地流傳了下來，不斷發揮其內在的價值影響。西京雜記雖不是上乘之作，但可以這樣講，它的確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奇書，一部研究秦漢史和古代文學史時應隨時翻檢取資的奇書。

該書的作者有劉歆、葛洪、吳均、蕭贇和無名氏五說，頗有爭議，迄無定論。然而以葛洪說最為流行，也較為接近歷史事實。

最早引用西京雜記的當推齊梁間人殷雲，他奉梁武帝之命，把凡撰通史所不錄的不經之說別集為小說，凡十卷。余嘉錫殷雲小說輯證一文，所輯小說佚文最為豐富，其中直接或間接引用西京雜記之文共十二條。又與殷雲幾乎同一時代的北魏人賈思勰，在其所著齊民要術一書中，也引用了西京雜記「樂遊苑」和「上林名果異木」中的內容。所以可以斷定，西京雜記之成書，必於南北朝之前。再具體一點的話，即在公元六世紀之前。

關於西京雜記的作者，於正史經籍、藝文志中，最早見於後晉劉昫的舊唐書經籍志，其在列代故事類和地理類中均明確著錄是晉葛洪撰。新唐書藝文志亦然。從唐代的許多記載中可以看出，葛洪作西京雜記是主流觀點無疑。正如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指出的那樣，張柬之說「昔葛洪造漢武內傳、西京雜記」，事詳晁伯宇續談助卷一；而劉知幾也於史通雜述篇中毫不含糊地指出「昔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此之謂逸事者也」。又初學記卷二十「賞賜」目下唯一一次注明引文出自「葛洪西京雜記」，則其他引文所謂西京雜記的作者不言自明。此外，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僅引「畫工棄市」一條，也認為是葛洪所作。這一情況也影響到了宋代，不僅太平御覽引書目中列有「葛洪西京雜記」，冊府元龜卷五五五又曰：「葛洪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固辭不就。撰神仙傳十卷，西京雜記一卷。」余嘉錫據玉海指出，「元龜之例，上採經史諸子及歷代類書，不取異端小說。其言葛洪撰西京雜記，必有所本，可補本傳之闕矣」。此論甚是。

至於蕭賁，據南史齊武諸子傳，他曾作西京雜記六十卷，其卷數與歷代著錄雜記僅一卷、二卷或六卷相去甚遠，當別為一書，完全可以不予採信。而段成式西陽雜俎借庾信語，以為是「吳均語」，四庫提要則指出「別無他證」，「亦未見於他書」，因此亦可置之不論。或以為南朝人所為，純系臆測，更不可憑信。因此唯一可與葛洪說抗衡的就只有劉歆了。

劉向、劉歆父子是西漢晚期著名的大學問家，他們也曾經續寫過史記，事詳漢書班彪傳李賢注和史通古今正史篇。但是無論是正史還是野史，都未曾言及他們著有百卷本漢書，唯葛洪西京雜記跋除外。與之相反，劉向、劉歆曾用了二十餘年的漫長時間整理漢代官藏典籍，撰作了中國第一部圖書目錄——七略，却史有明文。漢初統治者出於鞏固政權需要，有鑒於戰國以還特別自秦始皇焚書以來，典籍散亂匱乏，文獻錯訛互見，不利於以文興國，於是注重民間訪書，鼓勵獻書，至元、成之世，「百年之間，積書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太平御覽卷二三三所引）。書雖然多了，但書籍之源流，學術之變遷，作者之真偽虛實，典籍之錯漏程度，均不甚了了。於是成帝於河平三年（前二六），命劉向兼領校中五經秘書之職，除召集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等專門家參預校勘之外，其子劉歆也發揮了主力的作用。然而一方面校勘、提要等整理工作瑣碎而繁雜，另一方面他們又都是朝中重臣，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處理政務，所以劉向父子不可能再去寫一部卷帙多達百卷的漢書。班固確曾利用過他們的成果，但明確可行的只有漢書高祖紀贊直接引用了劉向的高祖頌，而藝文志則以

七略為藍本，加以編排提煉，餘則無考。

關於漢書的撰作，班固於太初之前，主要取材史記，又另補立了惠帝紀、王陵傳、吳芮傳、蒯通傳、伍被傳、賈山傳等，單立了張騫傳；太初以後，則以其父彪史記後傳為基本依據，也吸取了續修史記的劉向父子、馮商、揚雄等人的成果，但其抉擇甚精，從不輕用。另外，成帝時，班旃獲贈官中藏書副本，也是班固寫作的重要參考書。並且這批典藏吸引了不少學者前來觀書，其間的交流請益，對班固的寫作大有幫助與啓發，也使他得到前輩的賞識。據謝承後漢書所載，「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班固的十志，尤見新意，充分顯示其博學貫通的特點，許多成就還在史記八書之上，如刑法志、地理志、五行志等均系獨創，絕非劉向、劉歆父子所能企及。何況有的列傳，若非親歷，無法寫出。如漢書西域傳，記述西域五十一國，國別明，區域廣，述事詳盡，史記大宛列傳也難望其項背。之所以如此，是與其弟班超經略西域多年，熟知內情，給班固提供資料，密不可分。而劉向父子却不具備此條件。再則司馬遷因舉薦李陵，遭腐刑，有怨言，下獄死一事，出自東漢衛宏漢舊儀；揚雄論「讀千首賦，乃能為之」的為賦說，則採自東漢桓譚的新論。所謂西京雜記「并班固所不取」的劉歆漢書之文一說，當不攻自破。自然這并不排除有劉向、劉歆之作被葛洪所摘錄，實際上如劉向作彈棋以獻成帝，促使其放棄蹴鞠運動一事，就係錄自劉向的別錄。余嘉錫已詳言之，誠為信言。

東漢時期，由於帝室的鼓勵，撰史之風十分盛行。如東觀漢記、漢書的撰述，荀悅漢紀的問世，使紀

傳、編年二體基本定型，並成為以後歷代封建史家修史的楷模。又如諸雜史、別史、起居注、職官、儀注、地理、譜牒、耆舊傳等史籍新體的紛紛出現，使史學終於擺脫經學的附庸地位，形成獨立的學術門類。漢魏之際，史部的出現，即為明證。此風經魏晉人鼓動，更加如火如荼。然而長期的政爭與戰亂，史書旋生旋滅，漢代的典籍及文物，即便是片瓦只語，魏晉人一經訪得，莫不視為瑰寶，四處炫耀。好古之風，也引來了輯古書之風，鈔撮甚至編造兩漢之書，成為時尚。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葛洪鈔撰而成西京雜記，也就不足為怪。據晉書本傳所載，葛洪從不計較功賞，却常「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他「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著述頗豐，名作即有抱朴子、神仙傳、集異傳等。他特別喜歡鈔書，「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傳中雖未明言其作西京雜記，但抄撮史、漢及方技雜事，却與西京雜記性質極為吻合。聯係冊府元龜之記述，更加印證此事。之所以葛洪要冒名劉歆，究其原委，一則並非出於本人自撰，乃雜抄西漢舊聞，與自己文風不符；二則內容駁雜，非出於正史，作者已無從考見，難以引起士人重視；三則劉向父子續作史記，事涉漢史，記名順理成章，易見成效，又可借古自高。託古人之名以作偽書，由來已久，名人亦難免涉足，已非秘密。既然作偽，也難免漏出馬脚。正如多位序跋作者所言，西京雜記的內容，與漢書時有抵牾。特別是廣川王掘魏襄王冢，冢中所見竟與晉人石準盜發該墓，發現數十車竹簡及一枚銅劍之記述相去甚遠，足證雜記所言出於傳說甚或杜撰，絕非劉歆所當書。又如大駕鹵簿雜入晉制，也從另一側面透露此書成於晉